

杨虎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杨瑞华

杨虎故乡杨家村，座落在宁国县东南边陲旧十二都（今杨山乡），是个山峦环绕、阡陌纵横、风景秀丽的小平原。清光绪十四年（1888）残冬，在村东北隅山麓官园里的一座窑棚里，胡窑匠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呱呱坠地。

胡窑匠以烧制砖瓦为业，家无恒产，携带其妻及一对儿女流落在这里苦度日月，本来4口之家（长女6岁，次男3岁）就难得温饱，现在又添一孩，“好汉难养三口”，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夫妇俩无计可施。

穷人家对孩子“命名”并不重视，出生的男孩排行第三，就叫他“小三子”。缺食少衣的母亲瘦得皮包骨，乳水不足，常靠向人讨奶哺养的小三子却长得白胖细嫩，逗人喜爱。想不到在他出生后第二年（1889）的一个大雪纷飞之天，不满周岁的小三子的妈妈竟因病离世，胡窑匠哭干了眼泪，无钱料理后事，忍恻以稻草裹尸，在村邻帮助下埋葬了亡妻。此后，他既做父又做母，每天料理三个孩子，还要几次抱小三子到村上讨奶吃，实在独力难支，生活濒临绝境。万般无奈，遂决定将小三子卖给他人“给他谋一条生路”。经村人杨德理说合，年近半百的本村裁缝杨允龙夫妇买养了这个孩子，改

姓杨，按谱序取名德顺。这孩子就是以后的杨虎。

小三子出卖后的第三年（1891），胡窑匠又将年方 10 岁的女儿送给孝丰桐村何家做童养媳，以后，便带着剩下的 1 个男孩回广德杨滩去了。

杨允龙领养德顺后，杨氏族人严守封建宗法礼教，拒绝非杨氏血统的异姓之子入其族谱，凡祠堂行祭祀、聚会、族宴及分配祠堂公物等享益，小德顺都被排斥在外。

杨允龙，缝纫为业，憨厚善良，喜爱小德顺，其妻刘氏，因脸有麻子，故绰号麻婆，泼辣、凶狠，不喜欢德顺，且打骂频繁，因此小德顺起居得不到适当的料理，经常是长发垢面，衣脏褴褛，而且癞痢满头。

几年之后，年过半百的杨允龙，手艺活不多，生活拮据，便让小德顺替人放牛。不久，老夫妇先后病逝，小德顺从此终年为雇主放牛、打柴和做家内杂活。由于缺衣换洗，虱子满身，好心肠的村邻沈奶奶一遇见他，不嫌癞痢腥、身上脏、衣服臭，耐心地为 him 捉虱子。有一次，牛跑上山不知去向，找到天晚不见踪影，又不敢回主人家，确已饿极，来到沈奶奶家，沈奶奶见状十分怜悯，便炒了一碗鸡蛋饭给他吃完后又去找牛（小德顺对此感恩不已，1933 年回乡，有一天在盘山村汪凤洲家赴宴时，见到派人寻访请来的沈奶奶，他当即拿出 120 块银元相赠，以报当年之恩）。小德顺经常与杨克昌等七八个牧童在一起放牛，有一回同做“老虎捉羊娃”的游戏，他扮“老虎”，比德顺长两岁的杨克昌扮“羊娃头”带着一群“小羊”东奔西跑。扮“老虎”的德顺年纪较小，笨手笨脚，跑不快，逮不住羊，累得满头大汗。众牧童笑他是“没有用的老虎，捉不到羊”。而他往地上一坐却笑嘻嘻地说：“我是

不吃羊的虎，我只有卫护羊。”小德顺年幼无知，也分不清胡与虎，杨与羊，只知自己本姓胡，从小被父亲卖给杨家，是杨家把他养大的，怎能“吃羊”。

杨氏族人中并不把德顺当作族人看待，多声称“买来的胡孩”。于是，村上的孩子们也都戏谑地喊他双姓：“杨、胡”！久之，“杨胡”成了德顺的别名。这便是传说“杨虎原名杨胡”的来源。

族中，较为宽裕的杨克昌家对十分贫苦的杨允龙家常予周济，感情融洽，因之，杨克昌对小德顺也很亲热，从不歧视，大家喊他“杨胡”，杨克昌只喊他“顺子”。这便是杨德顺发迹后首先邀请杨克昌到身边给予多方关照和扶植的根源。

孤儿德顺 11 岁时，本村堂伯杨东阳的胞弟杨西阳（住县城西门，任大东乡钱柜书）回村探亲，见德顺品貌出众，聪明玲珑，顿生怜惜之情，东阳也认为若给他读书，好好培养，长大之后，定有出息，便建议胞弟领养。于是杨西阳便将小德顺带到县城，送入私塾读书。

德顺 12 岁时，厄运复起，杨西阳不幸病故，而一贯厌弃小德顺的伯母对他更以童仆相待，时常打骂，也不给他继续读书。这年正月间，家住河沥溪的族人杨宝书，进城走亲访友，见此情景，便到西街“魏天源”药店向与其素有厚交的老板魏木斋说情，请收德顺入药店学徒，魏老板满口答允，于是杨德顺作了药店学徒。开始，叫他放马和在店中打杂，有时还要带孩子，以后才让他学习炮制药材的一些简易劳动（如煎药、熬膏等）。到 17 岁那年正月，有一天他正在熬膏，忽闻后街传来马戏班玩马戏的锣鼓声，他年少好奇，忙跑去观看，他看得忘乎所以，及至忽然想起熬膏急忙归店时，看

到熬膏已溢满地无法收拾了，料定老板决不会饶恕，慌忙走出药店，逃出北栅，渡过西津河，才松了一口气。“逃到哪里去？”他边走边思索。最后，想起药店对面他的好友方城到他的舅父陈某（任宣城守备营长）家拜年至今未归，只有去找方城请求他舅父收留当兵。作了决定，走到港口，天色已晚，找到与魏木斋常有交往的“王仁寿”药店老板借宿一宵，王老板很同情德顺的处境，留宿待饭。次日行前，以铜钞百枚、布鞋一双和锅巴一小袋相赠。

德顺到宣城找到方城，说明情由和来意，方城深表同情，便向他舅父说情，他舅父终于接收德顺当身边的勤务兵。

年方 17 岁的杨德顺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作者杨瑞华是杨家村杨氏族中长者，编者在整理中参阅了退休干部沈渭川同志提供的资料）

古人赞宁国

“宁国自宋绍兴以来，其履道崇节之士、秉钧宣化之臣，彬彬辈出，在圻辅诸邑可甲乙数，而以例他省，则虽方州小郡，益鲜俪焉。盖尝闻其名山胜川为江南之甲，则所以炳灵毓秀固有所自。”

（按：题为编者所加）

——明·王皞《宁国县志·后序》

安庆“三二三”事件中的杨虎

闻 师

国民党汉宁分裂后，杨虎紧随蒋介石，充当了蒋介石为实现其独裁统治而策动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屠杀革命人民的一把“快刀”。

1927年3月20日，蒋介石到了安庆，企图改组国民党（左派）安徽省临时党部，欲将杨虎、管鹏、凌铁庵、张秋白等安插进安徽省党部，遭到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拒绝，蒋介石恼羞成怒，决心实行暴力镇压。遂召集随行的特务处长杨虎、副处长温建刚、交通处长陆福庭、参议刘文明、40军党代表李因、独立5师党代表姚觉吾、参谋李德瑚及总参谋长朱绍良等人密谋，并频繁接见安庆青红帮、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及土豪劣绅中的头面人物，策划捣毁国民党（左派）安徽省临时党部、安庆市党部和各民众合法团体。大刀会会首姚觉吾伙同劣绅舒沛澄，亲自跑到广济圩，以每人发4块大洋为钓饵，收买了百余名的地痞流氓、青红帮分子，组成一个由舒亲任队长的敢死队。并且议定：在同左派省市党部斗争中，负轻伤者赏大洋百元，负重伤者赏大洋500元，而丧命者则发大洋1500元。

3月22日晚，蒋介石派杨虎指示劣绅潘怡然等人，在安

庆义和园酒馆宴请鲁班阁帮会中的把头及收买的暴徒，杨虎、刘文明、姚觉吾、陈紫枫等人与之密谋策划第二天的行动。商定以各右派团体名义择于3月23日上午9时联合举行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

3月23日上午，街上各店铺门上多已贴着“本日欢迎总司令，一律停市一日，安庆市民大会订”的一种红纸墨字的印刷标语。集会前，蒋介石在其行营办公室内亲自召集朱绍良、杨虎、温建刚、刘文明、李因、姚觉吾等以及许多身着长袍短褂，不明身份的人再次闭门密谋策划。随后，杨虎即奉命指挥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和姚觉吾等人“提刀上马”出席所谓民众欢迎大会。在会上装模作样地通过了所谓成立安徽省总工会的决议。集会一散，杨虎、刘文明、姚觉吾、李德瑚、张秋白、陈紫枫等人即指挥手持棍棒、刀斧的敢死队队员、流氓打手500余人，蜂拥到左派临时省党部，大打出手，砸碎匾额，击破门窗，毁坏用具，抢劫文件，殴打党部工作人员及省“一大”代表，接着捣毁安庆市党部、左派省、市总工会、省农协会及省妇协会等，计殴伤数十人。随后，暴徒们牵着五花大绑的刘剑冰（省“一大”代表，女）、严子静（左派省农协职员）两人游街，最后一路燃放炮竹，大声喝彩叫喊，蜂拥至省公署总司令行营门前向蒋介石“报喜”、“表功”。于是，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三二三”反革命事件。

在事件暴发前夕，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闻陆福庭亲口透露蒋介石指使杨虎等人来安庆组织敢死队准备实行暴力镇压革命的阴谋后，即派辛焕文秘密通知省市党部负责人周新民、柯庆施等和参加省“一大”的多数代表携带文件分散回避，才未遭毒手。3月31日，郭沫若为此在南昌写了《请看

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蒋介石从南昌到安庆的一系列罪行。

蒋介石于事件暴发后，即积极拼凑反革命势力，以实行其反动统治。他扣押武汉国民党中央任命以李宗仁为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委员名单，另委陈调元、杨虎、李因、刘文明等 28 名政务委员，并委封建军阀陈调元为省政务委员会主席。

特务处长杨虎，在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中立了“头功”，被蒋介石委为五省清党总指挥。重要打手谢大浦被委为安庆大通芜湖指挥，安徽全省大规模清党运动开始，从此，白色恐怖笼罩着安徽。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 103 页

《志苑》1992 年第 2 期（总第 42 期）第 17 页

《中国国民党史》第 176 页

《安徽近现代史辞典》第 45 页

文脊山顶望天台

“宁山国也，其雄峙西北者文脊山，广袤数十里”，“极顶名望天台，万仞之巅，坦若平地，可三四十亩，中有水池，池有芦苇。”“游其下者，近瞻远瞩，无美不备，即一丘一壑，宛若仙界。”（题为编者加）

——摘自鲍明发《文脊山记》

杨虎与“四一二”政变

闻 师

1927年2月，上海方面在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部署下有几十万工人罢工，几千名工人武装起义，赶跑了北洋政府的镇守使李宝章，北伐军没费一枪一弹开进了上海。为收复上海立下大功的工人纠察队，为保卫胜利成果，继续维持社会治安。

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的次日清晨，杨虎等跟随蒋介石撤下郭沫若、朱绍良等匆匆离开安庆来到上海。从3月底到4月初，蒋介石为加速实现其统治地位而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准备以武力镇压革命和共产党人。曾在上海召集白崇禧、宋子文、李济深、吴忠信（淞沪警察厅长）等开过好几次秘密会议，并派杨虎、陈群等秘密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青帮头目商议反共清党事宜，指示他们盗用辛亥革命时“共进会”的名义网络党羽，拨给经费50万元（银元）。黄、杜等受命召集帮会各头目定计设谋亮出“中华共进会”的招牌，在报纸上登载大幅通告，公开收罗徒众，制订作战计划，购置各种枪械。蒋介石于4月初还成立了以白崇禧为司令、周凤岐为副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紧密配合杨虎、陈群的反革命行动。蒋介石部署就绪后于4月9日返宁躲在幕后指挥，

在沪则由其心腹杨虎、陈群直接执行其罪恶计划。

4月12日早晨4点钟以前，黄、杜、张分别集合他们的党徒。首先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到杜月笙家中残酷杀害。接着，工人装束的数万暴徒分头从租界出动冲向闸北、南市、沪西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驻地，展开全面进攻。同时，周凤歧派了四个团的兵力分别包围纠察队，假称调解双方冲突，令双方放下武器，趁机将纠察队武器全部骗走，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纠察队死伤近300人。第二天工人罢工集会游行示威，又被第二师全副武装士兵打死打伤工人100多人，陈尸遍地。杜月笙又指使其爪牙到处侦察共产党人，随时向杨虎递送黑名单，不断搜捕中共人员。

4月25日，蒋介石撤消淞沪戒严司令部，成立以杨虎为司令的上海警备司令部。5月7日，蒋介石又成立一个“中央清党委员会”，杨虎为委员之一。蒋介石这个唯命是从的把兄弟，在清党活动中实是尽职尽责。

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6月26日上午，江苏省委在四川路104号召开成立大会，会上王若飞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宣布陈延年为省委书记。当日下午，陈延年被捕。上海五友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与陈延年之父陈独秀是世交，得到陈延年被捕消息后，出于好心到处设法营救，汪找到胡适帮忙，胡又找到吴稚晖，但吴当时已是铁心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吴在法国时与陈延年有过密切的交往，但后来在信仰等问题上陈延年同吴作过坚决斗争，吴因此对陈怀恨在心，吴获悉此事立即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来一封“贺函”，实为告密信。杨虎本来不知道捕到了陈延年这样重要的人物，接到吴的告密信，立即严加

审讯，加之叛徒出卖，当场指证了陈延年的身份。陈自知身份暴露后必死无疑，但他视死如归，坚贞不屈。7月4日的晚上，陈延年被秘密押到龙华刑场杀害，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此外，杨虎、陈群还先后杀害了共产党员宣中华、何赤华、杨眉山、王鲲、宣中祥、龚子兴、卓兰芳、胡燕琴、吴子衡等多人。因此，上海民众对杨、陈两人恨之入骨，呼之为“养虎成群”。

宁汉分裂后，杨虎在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着实卖力，自以为有功党国，十分自负，竟与蒋介石争名争利，平起平坐，纠缠不休，使得蒋介石十分恼火，趁自己下野时也解除了杨虎的兵权。出任上海警备司令不满四个月的杨虎，与蒋介石关系开始有了裂痕。

资料来源：

《中国国民党史》第176、177、185页

《文史资料精选》第十四册第418、463页

《旧上海风云人物》

《文摘周刊》第533期

杨公馆见闻琐忆

杨克荣

杨虎是我堂叔，他本姓胡，两岁时其生母谢世，为解救胡家度日维艰，由我父德理两头说合，将他卖给年近半百尚无子女、我叔祖父允龙为子，按家族排行取名德顺。允龙是个裁缝，年老体衰，笨手笨脚，生活也不宽裕，我父经常给予周济，允龙死后，德顺帮人放牛，人小力薄，难得温饱，并常受别的牧童欺侮。我大哥克昌比他大两岁，也经常在一起放牛，每次都卫护他，还常从家中拿些锅巴、山芋等带给他吃。他并未把我大哥当作侄儿看，象看待好朋友一样。在族人中大多都把他看作是杨家买来的异姓孩子，十分歧视。我大哥不同，对越是受欺凌的人，越是热心帮助，所以德顺怀恩不忘。他出去当兵一二十年，逐渐有了名气。1927年在上海当上警备司令后，身边需要人了，首先叫我大哥去。可是我大哥忠厚老实，又无文化，实难任职，便给二百银元让他回家好好种田。接着叫我二哥克家、三哥克明、四哥克火去沪，不久二哥、四哥嗜烟爱赌被驱回家。后又带信叫我去，那时我才19岁，这年夏天，我与本村的王松柏同阵到沪。我们好不容易到龙华找到上海警备司令部。由传达副官带我们进去在楼上会客厅见到杨虎，他听说我是克昌的五弟，当即叫

副官写一纸条，并拿 10 块钱给我，带我到大场宝华寺警备教导团去受训。该团主任温克刚是杨虎的老部下，待我比较热情。在一起受训的还有家住河沥溪的明耀东（后在 63 师任中校副官长）。受训不到半年调我到上海参军办事处当中士，办事处主任是杨虎兼，副主任吴旻（字敏之，江西人），顾问李仲丞（桐城人，为江宁硕学，是杨虎的老师）、警卫队队长陈惠庭（宁国云梯人）。在这里不到半年，又调我到他在西爱威斯路顾家弄 19 号的公馆看大门。这里住着杨虎的两位太太蔡竹君和田容君，我三哥克明在此任家庭副官，还有杨虎的两个随身副官和小汽车司机。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年不到，因房东要房子，杨公馆又搬到环龙路 63 号与田淑君夫人住在一起，我们也随从而往。

1931 年是我来到上海的第四年，杨虎要我在公馆当帐房及管理家务琐事，直至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因此也经常接触不少人和事。

1932 年，杨虎任上海市保安处处长时，机构设在枫林桥，办公厅主任吴敏之、机要秘书陈益公（繁昌人）、第一科（军事）长姓文（名忘）、第二科（军需）长邹练和（南京人）、二科股长邹均和（练和之弟）、顾问李仲丞、秘书赵宝芝（又名寿吾）、特务队队长刘衡（湖南人）、纵队长王家宾（合肥人）、第十中队队长刘榕（南京人）、第十一中队附杨文郁（杨虎的义侄）。这时的随身副官有刘英（奉天人）、洪范（宁国云梯人）。环龙路 63 号杨公馆还设有门卫守护。

1936 年杨虎任淞沪警备司令后，更是威风凛凛，他的青帮八弟陈群任副司令，吴旻任办公厅主任、陈益公任参事室主任、邹练和任军需处长。派驻司令部的宪兵营长是姜公美，

李仲丞始终是杨虎的顾问。杨虎的副官多，分办公室副官、随身副官和家庭副官，随身副官又有前后之分，前副官六七个，其中有我三兄，后副官有五六个，其中徐万玉、王振是东北至交冯钦哉将军介绍来的。在环龙路杨公馆内有电话直通巡捕房和司令部，公馆门口除门卫外还有法国人所设的岗亭，因环龙路属法租界，站岗人是安南人（即越南人，当年为法国奴役），全副武装、手持长枪、腰佩长剑，日夜轮流站岗。杨司令每天去司令部时，除自己和随身副官坐美产林肯牌轿车外，还有三四位保镖人员乘吉普车跟后。每从公馆一出门，家庭副官即打电话通知司令部宪兵营，说是“司令官来了”，宪兵营立即列队洋鼓洋号迎接。杨司令每次回公馆时，环龙路、马斯南路上便衣警察起码有十余人护卫。

杨虎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炯炯有神，手如蒲扇。走路脚步快，吃饭也很快，从不多话，难开笑脸，满口的宁国乡音。他脾气暴躁，喜欢骂人、打人，司令部的文武官员和他的随从副官、司机等都怕他，只要见到他板起一副杀气腾腾的大面孔都是战战兢兢的，甚至连头也不敢抬，因为听说他在“四一二”大屠杀中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还有这样的习惯：如果明天要出去演讲，或是开大会讲话，首先就要秘书长替他写好讲稿，重要的讲稿还要请李顾问过目修饰：一是句子不能长，二是篇幅不能长。头天拿回讲稿先看几遍，晚上再背熟，次晨起床后即在花园或在阳台上再念、再背，这样吃过早饭后赴会，可以不看讲稿从容上台讲话。人们却不以为他是个老粗，倒象有几分文化修养的人。

1933年，杨虎任中华海员工会（设在乍浦路）筹委会主任兼中华海员特别党部特派员。张德铭任工会秘书长。在该

工会任科长的还有宁国的张东林、吴本安、杨兆庆等人。1932年，杨虎还担任了设在徐家汇路的“肇和中学”董事长兼校长。抗战胜利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任该校教员，这样，教员与校长经常来往并不引起别人的怀疑。

杨虎十分好客，与各界头面人物交往甚密，他们经常到环龙路杨公馆会聚，据我常见的有：国民党 19 路军军长蔡廷锴、原北伐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甘肃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朱绍良、川军军长范绍增、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民政局局长张晓松、警察局局长毛森、英租界督察陆宁奎、法租界巡捕房头头单阿莹、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曾任浙江省长）、王伯龄（北伐时期出任国民革命军军长）、孔祥夫（北伐军某军军长）、陈希曾（陈立夫侄）、陈群（北伐中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黄楚九，工商界的王晓籁、蔡竹君，戏剧界的梅兰芳、马连良、言菊朋，以及社会闻人顾竹轩，还有彭伯威也是三天两头来玩。来自故里宁国的友人徐云涛、叶汲三、饶味新和洪伯春、洪显春等。1934 年夏，徐云涛来沪与杨虎论及续修宁国县志事，杨虎大为赞赏，并慨然捐资主修。当即推举杨虎顾问李仲丞为总纂（聘函由宁国县政府发），徐欣然回县办理。杨虎后来举荐毛羽丰任当涂县长。要洪显春的儿子洪范任杨的随身副官，要杨宝书的孙子杨兆庆任其机要秘书。

杨虎发迹后，经常思念分散多年的胞姐胡英子，1928 年特请故里方锡侯代其寻找下落，方化了一年多时间终于在浙江孝丰西溪坞找到了。她这时已有二子一女，长子名叫何良贵，女名何水英，均接到上海玩过。胡英子在环龙路杨公馆

里住了一两年才回去。杨虎还为她在十二都（今杨山乡）、十一都（今仙霞乡）买了田和房产。我受命陪同胡英子游西湖，她在回忆中向我谈到他们姐弟少儿时代的悲惨生活状况时，不禁泪流满面。

1937年8月9日“虹桥事件”案发，实是日军蓄意挑衅制造的事端，那时我正在司令部。事件发生后，杨司令在司令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参谋长欧阳驹、副参谋长吴敏之、办公厅主任陈益公、秘书长朱侠等参加了会议，商讨对策。一方面向南京中央汇报事件情况及处理意见，一方面调集军队，作好战争准备。当时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当日下午在司令部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有不少中外记者参加采访，同时向各界展出被日军打死的我方士兵的图片，揭露日军蓄意制造事端的罪行，当时爱国人士无不愤慨。“虹桥事件”是上海人民抗击日寇蹂躏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不料蒋介石对此举不满，指责杨虎办事不善。

上海沦陷后，杨虎取道香港，途径武汉到重庆，他身边只带随身副官洪范、侄杨海生、茶房费荣春、房金鸾。不久，我便携眷回宁国寄住南阳村岳家。王松柏因有其老上司赵锡田（63师长）的关系，当上了宣芜师管区补充团团长，他的团部驻在双龙桥，他是我的结拜兄弟，1941年时要我去该团任军需。后来队伍开到浙江桐庐时，王松柏不幸被一个叛变投日分子张营长击毙，成了抗日烈士。抗战胜利后，杨虎从重庆回到上海南昌路59号的杨公馆，同道而归的有其长子杨安国、副官洪范、司机徐伯正，还有个在重庆新娶的太太姚文，以及章伯钧先生。我得悉后也赶到上海，走进杨公馆正好见杨虎送客出来，他问我“这八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

一一作了禀告。他要我仍在公馆看门，给我一支手枪，嘱咐我要密切注视进进出出的人。也只有一年多时间，杨虎叫田淑君太太介绍我到上海常熟区公所（宝庆路10号）工作，区长是杨虎的学生，当然对我也很照顾，要我担任经管荣毅仁先生住区的保干事，直到解放。

1946年春，杨虎在威海卫路组建了一个“兴中学会”（实为帮会俱乐部），杨虎为会长，副会长彭伯威，主要门生有：大门生孙履平（“兴中学会”委员）、二门生后火椿、三门生王寄一（常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系）、四门生阎锦文（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附兼第六侦缉队队长）、五门生陆火公（解放前夕接任毛森的上海市警察局长）。杨虎借“兴中学会”在上海和沿江一带军政警和工商界以及海员头头中，广收门生。在收徒弟时大多由副会长彭伯威先生主持。

杨虎当年不仅是杨西阳（又名允松）的桃子，并继承伯父允功为嗣，为三房后继有人传宗接代，先后娶了五位夫人，大夫人周玉麒（江苏上元周少彭长女，生于光绪二十四年），于1914年十月生子安国（又名小虎，字隼号乃佳，国民党军参谋长朱培德女婿，毕业于德国卢森堡炮科学院，今在台湾），继承允龙房；二夫人陈华，外号仙女，身材高大，交游广阔，1933年家族圆谱时，陪同杨虎回乡参加庆典，育子名华德，继承允功房；三夫人姓周（名忘）比陈华小一岁，生长子建国、次子卫国，继承西阳房。此后续娶妻妾有：田淑君，是一位精干女人，当年曾是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上海妇女理事会会长、《神州报》社主任、海员工会名誉理事、兴中学会副理事长，1946年当选为国大代表；蔡竹君（苏州人），生女名慧琼（今在香港）；田容君，生女名天麟（今在

台湾)；1929年又娶一个周氏，外号小老虎(今在美国)，生子名定国(上海大中华橡胶厂余老板的女婿，已有二子在上海)；在重庆娶的太太名姚文，解放后到北京时与杨分居；最后一位太太陶圣安，在北京不久与杨离婚到香港，成了台湾当局的特务，后来受特务机关的派遣，伙同田镜如到北京，向杨进行策反活动，最终受到祖国的法律制裁。(宁正春整理)

宁国天池堪称奇

官岭天池(今杨山乡盘山村西)，周数十亩，深宵莫测，云起即雨。近因山林破坏严重，池水始涸。

阳豪龙湫，即虹龙乡阳豪山绝顶处，龙湫喷涌而出，遥望如练。

千顷天池(今万家乡境千顷山与昌化接壤)，山巅有池约千顷，池中一山形似钵盂，即呼钵盂山。天将雨时，池中黑烟如线，袅篆半空，顷即密云四布，雷声隐隐。如今，池中鱼密，其味颇佳。

紫岩龙池(今上坦境)，山岭有池，盛暑凉爽，旁有仙迹，泉味清冽，煮茗特异。乡贤章礼让筑“紫岩馆”于麓，后倾废。

龙潭天池(龙潭山又名龙池山，今鸿门东境)，山下有石柱、石门、紫霞洞诸胜。邑人周赞重游此处避难诗云：“层峦千仞翠遮天，万片飞云九曲泉；怪底书生寒切骨，此身曾伴老龙眠。”(春辑)

——摘自旧县志